

民国时期陕西县志编纂的成就与特点

——以《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中心

王今诚

提 要: 明清时期, 陕西修志成就显著, 具有学界公认的崇高地位, 形成了优秀的方志编修传统。民国时期, 陕西在方志编纂方面的建树同样值得重视。以代表民国陕西县志较高水平的《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与同期名志《川沙县志》进行比较研究, 陕西编修完成的县志在指导思想、体裁创新、时代性、科学性、大众性、编纂手段等方面, 体现出承接传统方志优长、开启新方志编纂先河的鲜明特色, 诸如概述和大事年表的设置; 记述语言是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 重视对经济变迁、革命事业、政治建设、社会民生的记述等。

关键词: 民国时期 陕西县志 成就 特点

民国时期(1912~1949年), 陕西地方志书编纂成就显著。从数量上看, 民国陕西编成各类志书约127种。其中省级志书5种, 县级志书122种。比较著名的县志有《乾县新志》^①《洛川县志》^②《同官县志》^③《宜川县志》^④《中部县志》^⑤等。从编纂机制、体例创新、客观性、科学性、时代性、编纂思想等方面看, 民国陕西县志体现出明显的近代化特征。本文以《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考察对象, 以横向比较研究的方法, 深入探讨这一时期陕西省县志编纂的成就与特点, 总结经验, 启迪当今。

一 民国陕西县志纂修概况

近代以来, 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需要主动适应世界发展潮流。民国时期, 推进新志续修工作, 是促使中国走出传统家一国模式, 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一个内在要求。因此, 地方志编修为民国历届政府所重视, 基本形成政府主持创办、学者参与纂修、社会多方互动的格局^⑥。

民国5年(1916年), 陕西正式成立通志局(民国20年改为通志馆), 负责续修陕西通志^⑦。但是, 各县修志机构发展不平衡, 仅少数县份设局, 大多仍维持前近代模式。比较完备的修志机制当以黎锦熙的设计为佳。以城固县为例, 其做法是: 提出倡议, 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

① 续俭、田屏轩修, 范紫东等纂, 凤凰出版社2007年据西安克兴印书馆民国30年(1941年)铅印本影印。版本下同。

② 余正东修, 黎锦熙纂, 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据西京泰华印刷厂民国33年(1944年)铅印本影印。

③ 余正东、田在养修, 黎锦熙年纂, 民国33年西京泰华印刷厂印刷。

④ 余正东修纂, 黎锦熙校订, 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据新中国印书馆民国33年(1944年)铅印本影印。

⑤ 余正东修, 黎锦熙、吴致勋纂, 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据新中国印书馆民国33年(1944年)铅印本影印。版本下同。

⑥ 曾荣《民国通志馆述略》,《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2期。

⑦ 杨虎城、邵力子修, 宋伯鲁等纂《续修陕西通志稿》, 民国23年(1934年)版。

县长为当然委员；推举常务委员 5 人，县长为主席。编委会下设 3 个机构：一是总务处，专司经费、设备、印刷等事宜；二是调查委员会，全县小学校长及联保主任为当然调查员，但只是名誉职衔，具体调查工作由西北联大毕业生负责；三是编纂委员会，由西北联大教授和本县学界人士担任^①。但这仅是一种理想的方志纂修模式。实际上，在民国陕西省的修志过程中，包括黎锦熙参与的 5 次修志工作，均未完全付诸实践。

在方志名家范紫东、黎锦熙等人的探索和实践下，民国陕西县志近代化特征显著，取得了一定成就，形成了自身特点：一是陕西建立了省级修志机构，省内各县普遍进行了县志编纂。二是编纂方法和手段更加先进，如照像技术的运用、铅印的推广等。三是注重科学性，较明、清方志在编撰体例上更加完善，社会经济内容成为志书篇目设计的骨干。四是记述对象表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开始由重人事变为重经济；由尊君转向重民；记载了群众反抗斗争的大量史实。五是编纂出版数量可观，约有 122 种；编纂密度空前，数倍于明清两代。六是部分专业志承编人员具有相应的学科背景，不再完全由传统文史知识分子充任；编纂者大都是经过辛亥革命洗礼，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具有不同程度的民主、科学思想，吸取了西方史学观点、史学方法和近代科学技术文明的长处。

当然，民国陕西县志也存在很多不足，如“断烂不完”、缺乏资料，陈陈相因、粗制滥造，甚至有代表精英立场的偏见等问题；个别县志虽名为“新志”，但从篇目、体例、编纂思想、方法等方面看，仍属于传统方志范畴，很难体现出新志之“新”。

以民国《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例，可以发现其主纂人员均为一时一地文化名流，接受过近代教育，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热心社会民生；其在编纂机制、篇目设置与体裁创新、记述方法与语言章法、时代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编纂思想等方面，都代表了这一时期陕西县志纂修的最高成就。以《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与民国名志《川沙县志》^② 进行比较研究，将大大加深对民国陕西省县志编纂成就的认识，明确其在全国的应有地位。

二 《乾县新志》《中部县志》的篇目设置与体裁创新

篇目、体裁是志书体例的两个重要方面。在新方志编修观的指导下，民国方志体例受西方知识系统影响，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类目（篇目）。民国方志编纂面临着传统方志编纂学与现代知识系统的融合难题。新方志编纂的挑战不仅是用新的门类和名称将志料概括、表述，其实质是如何将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在编纂中深化的学理问题^③。因为，新方志之所以新，即是运用现代知识系统大类目，重新归类、表述记述对象。

（一）篇目设置的继承与创新。《中部县志》的篇目设置较《乾县新志》新颖很多，与传统志书相去甚远，多所创建，更能反映时代特征；与《川沙县志》相比，未设置大事年表、选举志（上卷记述科举选拔人才；下卷记述筹办宪政，选举地方议会始末）、议会志等部分，却多了党团志一卷，二者均富含浓郁的时代气息。并不是说《乾县新志》在设置篇目体例时，对现代知识系统、学科门类是隔膜和排斥的，其大致也遵循着门类体例“参酌志乘，融会新旧，并综敷地方情实”^④的原则。但是，其在利用现代社会经济分工门类、名称对志料的概括、表述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如未设工商或实业志，仅设“业产志”，而且把农业、工业、商业划分到职业门类下。

^① 黎锦熙《方志今议》，商务印书馆民国 29 年（1940 年）版，陕西通志馆铅印本。版本下同。

^② 方鸿铨修，黄炎培纂，民国 26 年（1937 年），上海国光书局铅印。

^③ 张鹏《论民国方志体例大类目的变革》，《中国地方志》2012 年第 11 期。

^④ 《乾县新志》，第 426 页。

《乾县新志》《中部县志》《川沙县志》篇目设置对照表

《乾县新志》	《中部县志》	《川沙县志》
卷首 序文、纂修职名、 凡例	卷首 序文、纂修姓名表、 凡例	卷首 图、目次、序文、职名、例 言、导言
卷一 晷候志	卷一 疆域建置志	卷一 大事年表
卷二 疆土志	卷二 气候志	卷二 舆地志
卷三 交通志	卷三 地质志	卷三 户口志
卷四 地理志	卷四 山水志	卷四 物产志
卷五 业产志	卷五 户口志	卷五 实业志
卷六 教育志	卷六 地政农业志	卷六 工程志
卷七 赋税志	卷七 工商志	卷七 交通志
卷八 事类志	卷八 交通志	卷八 财赋志
卷九 古迹志	卷九 社会志	卷九 教育志
卷十 金石志	卷十 吏治志	卷十 卫生志
卷十一 官师志	卷十一 自治保甲志	卷十一 慈善志
卷十二 人物志	卷十二 财政志	卷十二 祠祀志
卷十三 艺文志	卷十三 军警志	卷十三 宗教志
卷十四 文征志	卷十四 司法志	卷十四 方俗志
附录 杨文宪公遗著四卷	卷十五 党团志	卷十五 艺文志
	卷十六 卫生志	卷十六 人物志
	卷十七 教育志	卷十七 职官志
	卷十八 风俗谣谚志	卷十八 选举志 (上、下)
	卷十九 人物志	卷十九 议会志
	卷二十 宗教祠墓志	卷二十 司法志
	卷廿一 黄帝陵庙志	卷廿一 警务志
		卷廿二 兵防志
		卷廿三 故实志
		卷廿四 叙录

这就说明,利用现代知识体系归纳、记述固然重要,掌握某类学科知识的修志人才延聘更不容忽视。黎锦熙在制定《续修城固县志》编纂方案时,重点考虑利用新的学科门类更新传统志书的篇目,并主张专业性较强的卷应聘请熟悉本学科的专门人才。这是民国新志与传统方志在编修观念上的一个重要不同点。

(二) 体裁的继承与创新。《川沙县志》相比《中部县志》《乾县新志》,既有超越也有一致性。

一是概述的设置。《川沙县志》设置了全志导言和各卷下的概述,而传统方志只有作为编纂说明的序例。这些概述“重在简略说明本志内容之大要,而不尽阐明义例也”。《中部县志》《乾县新志》各分志有小序和概况,但论述过于简单,没有对本卷内容进行概括提升,只能作为阅读导言。如《乾县新志·赋税志》小序较为详细,历数税则变化与民众负担,多有讽喻。

二是大事年表的设置。黄炎培在深入研究传统名志后,吸收其体例精要,在《川沙县志》

第一卷设置大事年表一目,突出大事年表在方志编纂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大事分为国际、国内两栏,以之与县里大事相对照,这是一个重要特点与创新,掀开了方志编纂学的崭新一页。黄炎培认为,设置大事表可以搞清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可以避免一般方志偏于横向解剖而缺乏纵深的弊端^①。黎锦熙在编纂《续修城固县志》时,也主张设立大事年表一卷,可惜志稿未成。

三是图表的使用。《川沙县志》大量采用《川沙全境图》《出品得奖一览表》《教育统计》等图表120余种。《乾县新志》《中部县志》引用了诸如《阴阳历节气日期对照表》《地质构造图》^②《中部县历年雨量统计表》《出露岩层分布图》^③等图表,但数量和种类不如《川沙县志》丰富、灵活。黎锦熙强调“志书中应多列统计表,如土地、户口、物产、实业、地质、气候、交通、赋税、教育、卫生以及人民生活、社会经济各种状况,均应分年精确调查,制成统计比较表编入”^④。因为,数据图表在提高志书的史料价值方面意义重大。中国传统史著、方志不擅长运用统计数据,经常采用诸如“无算”“无数”等字眼,难以为后世了解、研究当时情况提供准确依据。

三 《乾县新志》《中部县志》的记述方法与语言章法

《乾县新志》《川沙县志》《中部县志》三部志书的记述语体为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的语言较为古雅、简明。比较而言,三者语言风格上做到了严谨、朴实、简洁;有意避免以方兴未艾的白话文展开记述,没有使用口语词语、方言词汇,专业术语使用很准确。三者正文中对记述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总结概括,有少量议论。其中《川沙县志》在导言、概述及类似于《川沙风俗漫谈》等部分,以富含乡情的笔调进行了适当而精彩的论述,无论从志还是史的观点看,对我们今天编修地方志书都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这或者就是《川沙县志》为什么令读者爱不释手的原由。相比之下,《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两部志书的语言章法则过于平淡,缺少《川沙县志》中体现出的那种人文关怀精神。

四 《乾县新志》《中部县志》的时代性

近代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市场,经济变迁加速,社会转型加剧,产生了对传统方志记述对象和内容进行评判与变革的要求。民国方志的记述内容,较传统志书有明显进步和发展,如对清末新政、民国鼎革、社会民生等均有记载,并以大量调查研究为基础记述县情。其中有关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事例记述随处可见。

(一) 对经济变迁的关注。传统方志重人文、政典而轻视经济的偏弊,受到了民国方志编纂专家的摒弃。陕西作为中国内陆地区,近代化的步伐滞后于沿海等口岸城市。20世纪30年代,陇海铁路陕西段陆续建成通车,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乾县新志》对男女平等首先是经济平等的认识十分深刻。“今之妇女,或不事纺织而高谈平等者。然家庭生产,不能平均担负。一线一履皆仰给于丈夫;依赖成习,平等何由取得?吾乡妇女,于平等之资格,可谓毫无缺欠,足令人起敬也。”^⑤这表明,该志思想观念很具进步意义。《中部县志·工商志》分析本县工业不发达是因为人烟稀少、交通梗阻之后,进一步指出抗日战争导致国民政府开发西

① 《川沙县志》,第8~12页。

② 《乾县新志》,第449~450,598页。

③ 《中部县志》,第54~55页,第64页。

④ 《方志今议》,第106页。

⑤ 《乾县新志·业产志》,第3页。

北,引起了近年来经济的逐渐繁荣。如第二战区西北制造厂的部分厂就设于该县;民国30年(1941年),本区专员余正东提倡纺织运动,督饬各县设立纺织工厂,该县购买了织机四架,交给新成立的中部县合作社联合社经营;民国31年(1942年)正式开工,“出品颇佳”。商业凋敝,其原因在于匪患;各城镇集会主要买卖的是猪、羊、牛、驴、骡、马等,粮食唯有县城、隆坊镇两处经营^①。《川沙县志》以十分客观、敏锐的眼光作了观察,以略带哀伤的笔触勾勒出口岸城市及其辐射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迷惘和阵痛”。《川沙风俗漫谈》描述“旧时妇女织成布匹,经纬之纱,都出女手。自洋纱盛行,而轧花、弹花、纺纱等事,弃焉若忘。幼弱女子,亦无有习之者。此今昔不同之一端,而生活中又少一技能矣。……女工本事纺纱,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虽多一生机,而风俗不无堕落”^②。展示出大机器工业逐渐取代手工纺织技术,妇女们离开家庭进入工厂的近代化图景。而且,《川沙县志》对本埠情形的观察与记述,与国内国际环境相联。如“凡工,始创则争烈,争烈而制精,制精而广销,广销而滥造,滥造则业衰,故实业行政重检验也。立法未周,良机已逸,欧陆销兵,市场变色。……此亦偏隅感受全球影响之明徵也”^③。这些笔触敏锐的记述,也为当代新编地方志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志体语言并非只是概言当地情事,更应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作出客观、科学的分析。

客观而言,《乾县新志》《中部县志》对地方经济的关注,不亚于《川沙县志》,但略显简单。面上的记述多,具体典型人事的记述不够,即对个体民众生活状态的关怀太少。这当然与编修者所处社会环境和个人精力有关,如黎锦熙在短期之内,作为主要纂修者几乎同时完成了4部县志的编订。

(二) 对教育事业的关注。《乾县新志》《川沙县志》《中部县志》三志,对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关注程度很高,均设有教育志一卷。教育志下基本设置教育行政、教育沿革、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教育统计等条目,而且女子教育受到重视。如《乾县新志》特别强调陕西省立乾县中学有学生600余名,其中就有女生一班。《中部县志》追溯中国教育发展史,注意到清末教育改革的重大变化,但未对地方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展开记述。但是,相比较《川沙县志》在记述教育时地方情感的溢于言表,《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两志则显得平淡。《川沙县志·教育志》概述写到:“(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川沙小学堂成立,影响所被,颇得学生家属之同情。……而邑人响应,私立学校纷纷而起。亦有校归公立,款出私家者。……利用天然生产,作为教育基金,此事亦堪纪念。”诸如此类的语言,在正文中也有很多表达,体现了纂修者并没有置身于地方教育事业之外,而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以生动活泼的实例和饱含情感的笔触,记录了群体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

(三) 对革命事业、政治建设的关注。民国方志因编纂者大都具有革命经历,记载了大量人民争取民主独立的斗争史实。范紫东在《乾县新志·序三》中讲述了自己参与辛亥革命陕西独立的主要事迹,同时在卷二疆土志中记述了县政府更迭,中国国民党乾县党部建立及其作用的情况。卷十二人物志记述了参加同盟会,维护民国的吴希真传略。总体而言,该志更加关注的是地方教育、文化建设。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篇目设置的陈旧势必影响记述内容,无法真正体现民国志书相较于传统志书的新。《中部县志·自治保甲志》概述了本县办理自治的历史,重点记述国民政府推行保甲自治、筹设县参议会的情况。对保、甲这一基层组织的功能、整理过程、办理办法、取得的成绩作了介绍。司法志、军警志对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了详细记述,颇有新气象。

① 《中部县志》,第109~116页。

② 《川沙县志·方俗志》,第7页。

③ 《川沙县志·卷首》,第10页。

党团志认为“中部有黄帝陵寝，此民族思潮之所寄也。清末革命事起，此邦志士，不甘落后，势若飘风骤雨，一夕反正。今各级党团区分部，皆已建立，而寇氛未靖，爱国青年，仍当力行无间，更不容有徘徊或退转之心理也”。其所收录对象为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川沙县志·选举志（下）》概述了川沙县自清季筹办宪政，组织地方议会的始末，其对地方自治终归夭折痛心疾首，对川沙人民始终未曾玷污选举深感自豪，详列筹备城镇乡地方自治公所简章、城自治职表、城议事会互选细则、乡自治职表、县自治选举概况及职表、三届省议会议员初选举、第三届国会议员初选举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对于乡邦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期望浸透在字里行间。

（四）对社会民生的关注。《乾县新志·业产志》集中记述了社会民生的内容，其有关纺织业的描述尤为生动。《中部县志》专设社会志，分为社会组训、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三部分，记述政府提倡社会运动、合作事业，建仓积谷，救灾恤邻等内容。在篇目设置与内容记述上达到了科学结合，具有典范意义。其社会救济一条，设有灾荒赈济年谱、难民收容、职业介绍三目，记述内容极富时代和地方特色。例如：需要介绍职业的人员，分为知识分子和一般难民。前者“县府按其能力，分别录用”，后成立职业介绍所专门负责安排工作；后者由“县府分发难民”到各乡镇从事副业，副业约分为诸如烧木炭、搬运煤炭、采药、挑水、出佣女工等20种^①，与沿海经济先进地区比较，均为传统谋生手段。卫生志部分还关注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食品热量、营养价值等。《川沙县志》在这方面内容的记述不如《中部县志》，但细分出慈善志一卷，从官赈、公赈、协赈、积谷、习勤、至元堂、育婴、养老、恤嫠、义冢、施衣米、施钱、除棺施棺等方面专门记述慈善事业。当然，该志其他各卷也记述了社会民生的相关内容。

五 《乾县新志》《中部县志》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民国方志特别重视记述内容的客观性，强调从源头抓资料建设。上述三志有专门篇幅，详述调查采访的计划制订和工作情况。通过调查采访，编纂者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志书，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方志的客观真实性。但是，调查采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续修新志时，调查统计县属各乡镇户口、土地、收入等经济数据的工作，往往为乡民耆绅疑惧，不予热情配合。只有向采访对象说明编纂地方志的事由，才可达到调查县情的目的。三部志书在记述中基本没有迷信内容，传统旧志中的星野、星占、象数等篇目为晷候、气候、地理、地质等科技术语取代，其内容大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记述。如较为保守的《乾县新志》中已没有祥瑞、灵异、仙事等怪诞、迷信的条目，而反映新兴科学的内容占很大比重。

六 主纂人员的编纂思想

民国时期，传统方志的编修观受到批判，修志宗旨的创新、方志编修中进化史观的倡导、民史观的推行、综合文化观的阐扬，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观发生重大变革^②。因此，在判定民国志书编纂水平高低时，一个十分重要的衡量指标，即是否运用新编修观指导编纂实践，这就需要考察编纂者的受教育背景、个人经历、思想倾向等因素。

范紫东、黄炎培、黎锦熙三人，均受过新式教育，思想进步，紧跟时代潮流，参与过影响中国社会重大历史变革的事件，更为难得的是，他们都有长期从事教育的经历，而且国学根底深厚，有较高的文学造诣。从个人经历来看，黄炎培领导了改造国民性的职业教育改革，关注实业

^① 《中部县志》，第141~142页。

^② 许卫平《论民国时期方志编修观的变革》，《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救国，与国共两党高层接触密切，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范紫东于宣统二年（1910年）加入同盟会，参与领导过辛亥革命在陕西的重大事件；在致力于教育的同时，倡导社会改良，入秦腔剧易俗社从事剧本创作，以图“改良社会，移风易俗”。黎锦熙始终任教于高校，专注于语言文字工作，热衷于新方志纂修。比较三者而言，他们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关注社会民生、国家政治。当然，从个人成就和社会影响力方面比较，黄炎培显然远远超出范紫东、黎锦熙两人。范紫东虽然是新式知识分子，但长期生活工作在陕西，其眼界和见识必受局限；黎锦熙长期任教于高校，极少担任社会职务。作为志书的主纂人，黄炎培和范紫东同为本县土著，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撰修县志驾轻就熟，信手拈来，无隔靴搔痒之嫌。而黎锦熙作为外来知识分子，参与编纂《同官县志》《洛川县志》《中部县志》时，定有当地人襄助，自然也不会背离实际，而且还会因“第三者”的视角多有创建。同时，黎锦熙十分注重实地调查，亲自撰稿，并参与设计、印刷、校对出版等工作。他的《方志今议》对方志的体例、编纂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主张“地志历史化，历史地志化”，其方法是续、补、创，即续前志以后的空白，补前志之所未及，创前志之所未能。强调方志的实用性，即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的作用^①。

结 语

从志书整体而言，《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与《川沙县志》有一定差距。但是，《中部县志》在篇目设置和体裁创新上，对《川沙县志》是有所超越的，《乾县新志》在调研采访、图表使用等方面所下的功夫丝毫不亚于《川沙县志》。

由《乾县新志》《中部县志》等志书管窥民国陕西县志，民国陕西地方志书在许多方面摆脱了传统志书的桎梏，在中国方志发展历程上显示出若干创新精神，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邮编：710069）

本文责编：杨海峰

2014年四川省民族地区年鉴编纂人员培训班举办

2014年10月8~10日，四川省民族地区年鉴编纂人员培训班在成都市举办。省地方志编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罗亚夫，副巡视员汪毅出席会议。民族地区地方志工作机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人员近百人参加培训。培训班由省地方志编委会市县志工作处处长曾新苗主持。培训班先后由四川年鉴社副编审李果、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张聂熙、曾新苗和罗亚夫分别作《地方综合年鉴框架结构与版式设计》《地方综合年鉴的适法性与编纂实务》《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属性体例比较》及《依法修志工作》的讲座。罗亚夫受省地方志编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的委托作总结讲话。

（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

^① 《方志今议·序》。

Review of Compilation Practice of the Health and Hygiene Chapter of the Second-round Local Records Zhang Fengyu(32)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econd-round county records on health and hygiene basically follows the model and structure of the first-round county records. However, overall speaking, the contents lacked clarity. There were no parallel correlations among the titles of chapters and first-level categories. Some titles lacked scientific clarity. Contents on diseases should be important composition of the health and hygiene chapter because of the closest correlation between pharmacy and health. But there were insufficient weighting or contents given to this correlation.

Analytical Review of Theories about the Falling into Pattern of Local Records Chen Zehong(35)

Issues related to the falling into pattern of local records, after discussions about the name of local records, their number and contents, and styles by various scholars, have become clearer and clearer. In local records development history, the falling into pattern of local records means that local records, as a form of literature, have been acknowledged as a whole by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have been widely promoted and applied after major changes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It also refer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from self act to self consciousness. The falling into pattern of local records makes the concepts about local records become generally accepted, makes itself an independent form of literature, and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istory and local records. Precise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falling into pattern of local records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rasping the proper limits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 Review of Local Records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Records Development Zhou Hui(41)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is a fine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 was born with the capability of self-renewal. This capability constantly demands gradual perfec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elf-renewal on current footing, i. e. discovery and application to the fullest extent of new methods and new techniques to reflect local information, and to enrich and bring to perfection the forms of expression of local records. Therefore, local records innovation does not mean the demolishing from traditional basic styles and the separate creation of a new form, but rather the constant realization of self-renewal, and the enrichment and perfection of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techniques of local information recording so as to adapt to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local information. The reason why local records are called local records is because local records have the basic style of horizontal arrangement of categories, vertical narr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narrations without argumentative contents.

The Achievements and Features of Shaanxi County Records Compil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Taking New Qian County Records and Zhongbu County Records as the Focus of Research Wang Jincheng(46)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had eminent standing generally acknowledg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formed excellent local record compilation tradit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Shaanxi's achievements i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were equally worthy of notice. Comparative research about New Qian County Records and Zhongbu County Records which represent Republican Period Shaanxi county records of higher level and the famous Chuansha County Records of the same period shows that, county records completed in Shaanxi province, demonstrated sharp features of inheriting the strengths of traditional local records and initiating new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in terms of guiding thoughts, style innovation,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time, scientific nature, popularity, and compilation methods, and in aspects such as the setup of general review and chronology, the transition of recording language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o modern vernacular Chinese, and the emphasis on recording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evolution caus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Local Society Belief Protocols as Seen from Tablet Inscription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Guo Chunmei(53)

The most important spiritual solace among people in Qing Dynasty Shanxi province has to be the worship of deities. At that time, temples scattered all over Shanxi province, and various deities were enshrined and worshiped in these temples. There were strict stipulations to things such as the funds for rebuilding and enlargement of temples in various villages, the apportion of expenses to dedicate plays to the deities, the time to worship the deities, the passing over of welcoming competition events from village to village of commonly worship deities, and protection of temples. These phenomena reflect the soci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production level, and level of medical care among common people in Shanxi province, and the highest forms of worshipping and pleasing the deities in popular beliefs, and demonstrate the plain wishes and spiritual anchorage of the villagers. The strict enforcement of belief protocols had great historical impact on Shanx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ources protection, inheritance of the dramatic culture, and the uplifting of public ethics among the people.